

北京市東城區文史資料選編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市东城区文史 资料选编

第 五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4年12月

目 录

对东城区政协的回顾..... 于水旺(1)

——纪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45 周年

忆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春天里 刘衡玘(28)

张自忠路溯往 金继德(39)

毛主席在东城住过的两所小屋 谭伊孝(46)

东城区名人故居 谭伊孝(48)

父亲沈钧儒与我的绘画 沈叔羊(63)

忆冯友兰先生 马凤荪(69)

我的祖父奕元在宗人府 爱新觉罗·溥筠(75)

关于《生死关头》一文的介绍 刘保琴(79)

生死关头 刘敬宜(81)

1945 年—1948 年“北平市工会”的组织

和活动概况 辛 生(86)

北京市第二中学的历史回顾

..... 北京二中校史编写组(129)

七秩扬芬话大中 爱新觉罗·溥筠(143)

清末民初的东城诗钟活动 王鹤龄(158)

我们在协和医院的护士生涯..... 邵莲英 邵桂英(163)

旧京东城的近代体育运动综述	吴逸民(175)
忆青年会往事片断	穆家麒(188)
北京的珠宝业	李春山(193)
北京钟鼓楼风物杂记	靳 麟(209)
北京钟鼓楼历史沿革暨修缮纪实	郑 毅 阎公展(222)
钟楼的建筑艺术与钟声的传递	郑 毅(234)
钟鼓楼与古代报时	郑 毅(236)
钟鼓楼的平民游艺场	吴逸民(239)
北京早年的老茶馆儿	王叔养(247)

对东城区政协的回顾

——纪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45 周年

于 水 旺

区政协是全区人民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共东城区委与本区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阶级、阶层、各民族、宗教，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合作、协商办事的重要组织形式；是上述各界代表人物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是区党政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接受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40 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 16 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战略重点转移，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逐步形成并发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行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在这种大形势下，我区社会稳定、人民团结、民族祥和、经济发展、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作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40 多年的一名老兵，回首往事，深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组织最广泛地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职能作用，确实是战胜艰难险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一大法宝。

一、关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11月30日就发布了《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明确规定“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的初期，应以各界人民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在北平解放后的1949年7、8、9三个月中，中央连续通知在3万人口以上的城镇，“不论新老解放区，在解放二至三个月后，即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8月召开的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开同样的会议。全国政协成立后，根据中央精神和共同纲领的规定，在中共北京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原一区（后东单）、三区（后东四）分别于1950年6月和8月，先后召开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仁为主席、以陈哲文、李秀德为副主席和以宋国藩为主席、以樊志刚、施复湘为副主席的协商委员会。1951年8月，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分别选举了以苏捷为区长、以赵濂、陈哲文为副区长和以樊志刚为区长、以李文澜、李仰岳为副区长的政府委员会，将区公所改为区政府，成为一级政权机构。1952年7月8日，两区分别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因行政区划的调整，区政府委员会和协商委员会均未改选，1952年9月，东单区和东四区分别召开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以周仁为主席，以陈哲文、李秀德为副主席和以宋国藩为主席，以施复湘、王宇、崔政文为副主席的两区第二届协商委员会。一直到1956年。

1. 关于建立协商委员会的意义

李维汉同志在1950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

会议上的报告指出：“人民代表会议闭会之后，协商委员会一方面继续协助政府推行政策法令，协商并提出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另一方面协商委员会又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民主阶级及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的统一战线组织，可以而且需要经过它去进行一般的统战工作”。

2. 关于协商委员会的性质

协商委员会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协商组织。一切协商机关的党派、团体或个人，政治上均受《共同纲领》和各种协商的约束，不得违反；但对重要协议根本不同意时，有申请退出协商机关之自由。协商委员会与同级人民政府之间无领导关系。协商委员会不是政权机关或政权性质的机关。不是行政立法机关，不是政府机关的隶属部分。协商委员会决不是无足轻重的组织，而是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之一，是人民政府经常进行协商和取得建议的机关，是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特点的创造。它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有长期存在可能的。政府机关应尊重协商委员会的地位和职权。（李维汉：关于各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951年6月13日）。

3. 关于协商委员会的职能

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二十五次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工作意见》中规定了十一项，主要是：

(1) 协助人民政府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并了解其执行情况。

(2) 协助人民政府联系人民，征求并反映人民意见。

(3) 审议政府交议的文件和议案。

(4) 有系统地收集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教卫生、市政建设、

宗教事务及其它方面的材料,进行研究,提出意见,供政府采择。

(5)分别地或联合地召集各界人士座谈,协助人民政府,解释政策法令,并征求对政策法令的意见。

(6)接受人民的建议、询问、要求、申诉与批评,并负责加以适当的处理,务使有着落、有交代。

(7)协助与推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参加各种人民革命运动及建设工作,目前尤其要有计划地组织工作团、参观团、视察团等,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及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

(8)组织时事座谈和学习会,协助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进行时事的、政策的和理论的学习。

(9)协助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解决相互有关的问题,加强其团结与合作。

(10)对民主党派的发展及训练干部等工作,予以可能的协助。

(11)协同人民政府,筹备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人民日报》根据上述精神,于1951年9月7日发表了《进一步加强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工作》的社论,我区闻风而动,为协商委员会配备了专职干部、完善了组织机构,由中共区委一把手兼任协商委员会的主席,使协商委员会的工作,日臻完善。

协商委员会先后设立了《房屋修缮委员会》《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社会教育委员会》、《劳资协商推进委员会》、《优抚救济委员会》等机构,分别负责开展各方面的工作。采用了协商会、报告会、座谈会、学习会,讨论、参观、视察、访问等各种形式,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

1. 开展了政治协商,提高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50年中期至1952年上半年,第一届协商委员会在不到二年的时间内,先后协助区人民政府召开了五次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和两次临时会议，筹备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出席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会上，对政府的工作，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房屋修缮，爱国卫生、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取缔一贯道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和拥军优属工作提出上千条意见和建议。引起了区政府的重视并认真做了处理。如原一区第一次会议就提出各类提案 142 件。提案得到解决后，提案人反映非常强烈，不少代表反映：“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

2. 进行了学习和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了各界人士的思想认识。

北京刚刚解放，许多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太理解。再加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反面宣传，更使一些人有不少误解，因而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对提高人民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激发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非常必要。

协商委员会成立后，组织各界人士学习了《共同纲领》和毛泽东同志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使大家对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人民政权的性质，经济制度，四面八方政策，公民的权利义务等有了基本的理解。同时结合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的讨论，学习了《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开展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教育，对崇美、恐美、亲美思想有了很大克服。结合宗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开展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教育；结合《婚姻法》的颁布，宣讲了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协商委员会协同区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开展了中国人民和平签名运动。全区先后有 20 多万人签名。1951 年 10 月 15、16 两日，一、三区协商委员会分别召开了有 7000 多人参加的《欢迎中

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与会者听了战斗英雄事迹的报告，各党派、团体向战斗英雄代表献词、献歌、献旗，并委托代表们转送慰问信，会场上向英雄们学习，向英雄们致敬的口号此起彼伏、经久不息。配合五反运动的开展，对工商界进行了爱国守法教育。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都适时组织了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激发了民族感情，增强了爱国热情。从而团结和调动了各界人士，积极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努力做出贡献。

3. 开展了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活动。

根据协商委员会的提议，原一区和三区分别于1951年6月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临时会议，讨论本区各界人民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问题。一区决定动员捐献17亿元（旧人民币）。三区决定动员捐献15亿元，实际完成17.76亿元。动员的重点是地方人士、殷实富户和退職文武官员。经过努力超额完成了捐献任务。据三区统计，捐献100万元以上的有245户，1000万以上的有27户，最多个人捐款8000万元。两区合计捐款35亿多元。按当时黄金牌价每两99万元计算，折合黄金3500多两，折合美元24万多元。

这类活动，已形成我区爱国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文化大革命”后新的区政协建立。经常有各界人士的义务捐献。区个劳协从1981年至1991年的10年间，先后收到个体会员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为抗洪救灾，为筹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等先后捐献45万元。区政协委员、香港繁荣集团总裁黄柏龄女士为142中学捐款5万元，被142中学聘为名誉校长；香港同胞李晓华为22中学捐款200万元，改善办学条件，受到陈希同同志的接见；光翌遮阳蓬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市政协委员赵昭亮捐款400万元，为景山学校修建教

学楼；台湾同胞刘仕伦女士捐款 30 万美元，修缮石经山云居寺……说明我区的爱国统一战线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4. 协助党和政府，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北平和平解放，公布了约法八章，其中第二章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共同纲领制定的四面八方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目的是繁荣经济发展生产。1951 年年底成立的领导五反运动的《节约检查委员会》，就吸收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参加。劳资协商推进委员会也主要是通过各种劳资协商活动，调整各厂、店劳资关系，推动原工商业者，接受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1 年 3 月，成立了区工商界学习筹备委员会，开办了工商界学习会，据三区有关文件记载，第一期参加学习的有 130 多人，第二期学习的有 270 多人，主要是学习《共同纲领》，同时号召他们对人民忠诚老实。每期学习半年。通过学习，使工商业者提高了思想认识，解除了‘不知买卖能做多久’的思想顾虑，懂得了劳动保护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重要性，从而主动纳税，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活动。同时还有一批人交待了曾参加过特务、还乡团、国民党、反动会道门等政治性问题。五反运动后，集中开展了爱国守法教育。

1953 年以后，集中开展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通过教育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我区一批比较开明的工商业者经过党的教育，从 1954 年 6 月开始，先后有稻香春食品店、艺华乐器厂，中国福康牛奶畜殖公司公私合营。1954 年 12 月，粮食业全行业合营，1955 年中期，又有大华百货公司、王府百货售品所、仁立麻纺

厂公私合营。1955年10月,棉布业全行业合营。到1955年12月和1956年1月,出现了全行业的合营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改造企业的任务,基本完成。

随着企业改造的同时,加强了对人的改造。我区贯彻了中央提出的“以政治思想教育为统帅,以学习和劳动实践为基础,以企业和工作岗位为基地”的三以方针,开展了学习、组织了劳动,总结了经验,表彰了先进,收到了好的效果。1958年大跃进中的三放——放弃高薪、放弃定息,下放劳动,引起了工商界的波动。我区又及时贯彻了中央提出的“高薪、定息、学衔、适当的政治安排和和平改造政策”五个不变的政策,调整了阶级关系。先后运用“神仙会”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后又加上不装袋子、不转企业,不作为处理的根据等方针开展了思想教育。要求他们按照刘少奇同志代表党和政府要求的,要“顾一头、一边倒”,党和政府则要包一头、包到底,加速改造。1960年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工商界、知识界、民主党派”三个大有进步,1962年进一步评价是:在大有进步的基础上又有进步。经过十年内乱的考验,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庄重宣布:“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他们之中有劳动能力绝大多数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84年统计,我区参加公私合营的8100多名原工商业者中,仍在我区工作的有3078人,其中有232人是随着合营进来的私方家属子女,有2389人被区别为劳动者,未区别的457人中,有177人不幸去世,有200人已办理离休退休,只有80人仍在职工作,已全部加入了工会,成为工人阶级新成员。已退休离休的200人中,全部将绿色的原工商业者退休证、离休证更换为红色的干部或职工退休证或离休证件。至此消灭阶级改造人的任务基本完成。

二、东城区政协的建立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年2月11日第22次会议讨论通过了《选举法》。邓小平同志在关于《选举法》的说明中提出：“选举法的通过和公布，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阶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行，将大大增强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效果，将使官僚主义者、命令主义者和违法乱纪分子失去藏身之所，它将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并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更臻完备。它将更加增强全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并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行，人民政协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区于1953年，已着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政协怎么办？大家非常关心。1953年7月中央召开的全国第四次统战工作会议，对此专门进行了讨论，明确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此以后，它应作为独立的统一战线组织而继续存在。并须在一切必要的地方设立地方组织，其名称仍可沿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12月25日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政协章程》，规定除省、直辖市、市设立政协外，其它地方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设立地方委员会。1955年3月9日中共中央就市、县设置政协问题专门作出规定，明确规定上海、北京……八个城市的区一级，是否需要设立政协委员会，由各该市委决定。1955年7月中旬，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我区阶级状况和民族关系都比较复杂，各个宗教门类齐全，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确有一批工商界的代表人

物需要安排。同时北京是华北地区最后和平解放的城市，一些社会贤达、起义将领，名门望族的代表人物也需要做些安排，所以研究决定，东单、东四分别建立区一级的政协组织。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东单、东四两区分别于1956年5月成立区政协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委员的构成包括了党派、团体、民族、宗教、经济、科技、文教、卫生特别邀请人士等16个方面的139名和150名人士。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分别选举了以周仁为主席、以李锡慈、陈哲文、田志臣、俞京生、杜冠武、龚培春为副主席、以黄兆熊为秘书长和以王曾涛为主席、以张国良、凌云、李文澜、冀岩、施复湘、董化棠、蔡文焕为副主席，以陈立忠为秘书长的两个区政协常务委员会。

鉴于当时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期，因此在委员的构成中，走公私合营和合作化方面的代表人物占的比重较大，（如东单区约占30%），经济界、知识界、少数民族、宗教界以及旧军政界，都占有适当比例，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虽有一些分散在各界之中，基本上没有作为参加政协的界别。又由于全国人大正拟宽大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反革命罪犯，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都把对蒋、日伪战犯和其它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作为重要议题。

关于政协的任务，1954年陈毅同志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讲到政协组织可以搞些什么事时说：第一项任务是协商国际问题，如对外发表宣言，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等。

第二项任务是协商候选人名单。

第三项任务是提意见。

第四项任务是调整关系。国家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关系，政协主要是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公私关系。……

第五项任务是学习。……学习是自愿的，马列主义也是要自愿

学习,而不应该强迫。……

区政协的建立,使区的协商机构趋向完备,有了专门会址——东单区在建国门内遂安伯胡同。东四区在北新桥四眼井胡同。两区分别配备了三名专职干部,其中有一名专职副秘书长驻会办公。由区财政局专门拨给必要的业务经费,同时聘请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为驻会委员。1958年7月,东单、东四合并为东城区,原东单区政协副主席杜冠武和14名委员以及原东四区政协副主席董化棠划入朝阳区。东城区政协会址迁到地安门东大街中华圣洁教会旧址办公。后因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东城区筹建手表厂,政协会址转让给东城手表厂生产手表,区政协迁到东四北什锦花园25号。1959年9月,区政协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委员会会议,选举周仁为主席,刘文伯、张国良、凌云、俞京生、施复湘、蔡文焕为副主席,黄兆熊为秘书长。1960年7月,周仁同志另有任用,改选魏彬为主席。1961年12月区政协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魏彬,副主席刘文伯、张国良、凌云、俞京生、施复湘、蔡文焕连选连任,改选刘广恩为秘书长。1964年11月,四届一次会议,主席魏彬,副主席张国良、凌云、俞京生、施复湘连选连任,增选戴镜元为副主席。刘广恩继任秘书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区政协的组织逐步健全,工作逐步规范。

1. 组织机构日趋完善。设立了常务委员会主持政协日常工作。在常委会下,先后设立了学习委员会和社会联络、医药卫生、教育、工商、妇女、民族、宗教、归侨等工作组,分别联络各界委员,开展各方面工作。

除了一年一次的全体委员会议外,常委会经常就全区的重大工作、活动安排与全区人民生活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听取意见建议。各工作组主要是组织本方面的委员,搞一些协

商和专业调查。

2. 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 大力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 主要有①组织了有部分委员和 300 多名非委员的各界人士参加的学习组, 每周一次, 学习座谈讨论时事政治、党的方针政策, 每组指定召集人, 每周六坚持召开召集人会议, 研究讨论带有共性的问题, 部署下周活动。②印发了全国政协和北京市政协编印的学习资料, (每年大约 10 期左右)。③举办了有关时事、政治、理论、政策的报告, 讲形势、讲任务、讲政策、讲要求, 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教育。④举办讲座, 每月一次。如请了革命老干部讲长征,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请国营商业, 街道工业讲经济发展, 进行形势教育。如一个街道工厂, 从生产铁簸箕发展到生产高档文具, 并远销国外, 每年出口创汇若干, 给大家很大鼓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活跃学习生活, 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孔子与周易作者是如何看待变革的》一文, 开展了热烈讨论, 许多人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并且争先恐后形成了学习热潮。在讨论中明白了变是绝对的, 不变是相对的道理, 使大学的学习情绪不断高涨, 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3. 大力开展了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兼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 倡导参加政协的各界人士, 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 传之后代。我区政协从 1959 年底开始, 下大力量开展了收集整理文史资料的工作。从 1960 年到 1966 年的七年时间内, 我区收集到从晚清到民国, 包括政治、军事、社会、人物、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史料 467 篇, 共约 238 万字。其中有数十篇被全国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刊载。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易礼容, 多次来我区指导研究收集整理北洋时期的文史资料, 对今后编史很有参考价值。这项工作不仅联系和团结了一大批

社会各界人士,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而且填补了某些历史空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史工作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一步发挥了区政协在征集史料方面的优势,使这项工作有了长足进步。从1979年至1993年的14年中,继续收集整理各类史料939多篇,共约664万多字。先后编印了《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4辑,同时与市政协合作,编辑出版了《老北京的生活》和《王府井》两本专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4. 建立文化俱乐部,活跃委员生活。

文化俱乐部是政协委员自编自演、自我娱乐、自我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下设诗词组、书画组、棋奕组、京剧组、歌咏组、时事座谈组……。诗词书画组曾为本会委员溥雪斋、马晋等人专门举办了画展,诗词组每周组织载亮吉、夏莲居等一批文人墨客研究古体诗词,你作我和、非常活跃。棋奕组曾组织委员和各界人士举办象棋、围棋比赛,歌咏组于每年的中秋要举办月光晚会,为了演出差不多每周都要组织排练革命歌曲。京剧组除每周五定期活动外,每年都要组织演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会常委金蕊秀,是晚清溥仪皇帝之三妹,在京剧《四郎探母》中扮演铁镜公主,真公主演剧中人公主,溥仪溥杰都来观剧,一时传为佳话。

“文化大革命”以后,政协恢复活动,文化俱乐部继续得到坚持和发扬。特别是歌咏活动,以台胞台属和黄埔同学会成员为主要阵容的合唱团,多次在全区“五月鲜花”、“群众艺术节”、教师节组织演出,并获得优秀奖。书画界一些老人,多次在新年,春节期间为烈军属书写春联,为九九重阳敬老日挥毫泼墨,祝老人们健康长寿。京剧组为庆祝建国40周年和中秋节,组织了彩唱折子戏,受到委员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